

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

介绍和说明：

收在这一组中的八篇文章，都是针对我国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当前的热点问题写成的，它们力图对这些问题作出回答和澄清。

自从我在 70 年代末期把‘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系统地介绍到我国以来，由于适应于改革开放形势的需要，引起了我国学术界的广泛兴趣，甚至在海峡对岸的读者中也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但由于这一思潮具有其固有的复杂性，它在呼吁“回到马克思原来的设计”，研究当代的新情况、新问题时，又以用现代西方唯心主义哲学的某个流派的思想去解释、发挥、结合和补充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这就为统一认识和准确把握这一思潮的性质带来了一些困难。早在 1986 年 8 月在长春召开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现状’学术讨论会上，有的发言就表现出主张把西方马克思主义等同于马克思主义，鼓吹指导思想上的多元论的倾向，从 1988 年开始，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性质的不同认识，终于发展成一场历时数年、扩

展到《人民日报》等十多家报刊杂志乃至海峡对岸的有关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讨论和论战。后来,论战虽然结束,但上述那种倾向却并未绝迹,而是一有适当的气候和土壤又重新表现出来。这种倾向尤其喜欢用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中一些共产党员代表如卢卡奇、葛兰西、阿尔都塞等人作典型实例,来论证他们的观点:既然他们都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共产党的党员,并说过赞扬列宁的话,那怎么能够把以他们为代表,乃至创始人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说成是同列宁主义相对立的呢?对此,我认为,不能凭想象、通过推理来解决,而必须用对这些人的思想和代表作的具体的、实证的研究,来作出回答。

这一组里的第三至第八篇文章,正是对卢卡奇、葛兰西、阿尔都塞的思想的具体的、实证的研究。

写作有关卢卡奇研究的两篇文章的背景,是有些人在《人民日报》等报刊上公开发表文章,把卢卡奇在《历史和阶级意识》中提出的唯心主义实践观硬说成就是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说“它所提出的命题和学说,至今影响着处于改革运动中的各国马克思主义者”;说它所“开辟的思想道路的确就是我们理论工作者今天正在进行的改革之路”。这就超出了对卢卡奇个人评价的范围,而涉及到我们改革的方向问题了。因此,我一连写了两篇文章进行辨析,《青年卢卡奇实践观评析》和《透视青年卢卡奇热》,这两篇文章在《德国哲学》杂志第11期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2年第3期发表以后,引起学术界的密切注意,特别是《透视青年卢卡奇热》一文被人大剪报资料转载,并被1993年《中国哲学年鉴》所摘要介绍。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两篇文章批评的观点此后没有再出现。

写作《葛兰西的实践哲学和马克思的哲学世界观》一文的

背景,是因为在我国学术界深入讨论马克思的哲学世界观的时候,有些人把葛兰西的实践哲学提出来,把它说成是对马克思哲学思想的深刻理解,说葛兰西坚持的实践第一原则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并说葛兰西从实践意义上理解物质的思想完全符合马克思思想。在这种情况下,迫切需要有文章深入剖析葛兰西实践哲学的实质,弄清楚它同马克思哲学世界观的关系,以明辨是非,这篇文章就是适应于这种需要而写的。文章在 1996 年第 3 期《中国社会科学》杂志发表以后,当即被人大剪报资料所转载,接着又被 1998 年第 1 期英文版《中国社会科学》翻译成英语发表。

写作有关阿尔都塞研究的三篇文章的背景,是因为近年来又有些人把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说成就是马克思主义,甚至把阿尔都塞直接取自结构主义主体移心论的所谓‘历史是没有主体的过程’的观点,说成‘其理论底蕴无疑是历史决定论的’;为此,我先后发表了《阿尔都塞的理论反人道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载于 1997 年第 1 期《马克思主义研究》)、《阿尔都塞的多元决定论和马克思主义》(载于 1997 年第 3 期《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阿尔都塞的反经验主义认识论和马克思主义》(载于 1997 年第 3 期《中国社会科学》),比较系统地辨析了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观点,揭示了它们同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区别,这三篇文章在学术界也引起较为广泛的反响,它们立即被人大剪报资料全文转载,其中《阿尔都塞的多元决定论和马克思主义》一文,还被人大剪报资料连续三辑全文转载。

除了以上六篇专论之外,收在这一组中的另外两篇是总论性文章:《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若干问题》一文,最初是在 80 年代末—90 年代初我国学术界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大辩论告一段落以后,我应《人民日报》总编室《内部参阅》之邀,

针对着那场辩论中提出的问题而写成的,以《什么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为题发表在 1993 年第 23 期《人民日报》的《内部参阅》上,接着又以《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几个问题》为题公开发表于 1994 年第 4 期《学术界》上;《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中若干问题的辨析》一文,则是就王雨辰对我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提出的批评意见而写的反驳文章。这篇文章的特点在于它既是带有总论性的,又就王雨辰提出的问题对柯尔施的思想观点进行了专论性的研究。

从 1978 年我开始发表有关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文章以来,20 年来我先后发表了有关这个主题的文章 40 余篇、专著 8 本。收在这里的 8 篇文章和以前的一些论著在思想观点上是一脉相承、息息相通的,但从风格上说,则更富论战性,更加圆熟地表达了我的看法。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说过:“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①,我想,对于文章来说也是如此,因此我在这里收入的文章,都是在 1991—1998 年写的和发表的。

一、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若干问题

“西方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一个地理学概念,而是一个社会思想史概念,一个意识形态概念。它指的是一种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产生于特定的时间和地点,具有特定内容的思潮。

“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出现

“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所据以产生的历史背景,是第一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第 2 版,第 23 页。

次世界大战以后，俄国的十月革命取得了胜利而西方国家的革命却相继遭到了失败。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及战争所造成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方面的灾难性后果，使资本主义矛盾更加深刻和空前尖锐起来，它促使西方国家的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到摆脱剥削和压迫的社会主义革命中寻找出路，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榜样更极大地鼓舞了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于是，从 1918 年到 1923 年，在德国、奥地利、匈牙利、意大利等国家和地区，先后爆发了骚动、起义和革命，但却一个接一个地失败了。

在这种情况下，西方国家的共产党人和左派开始对这些革命失败的原因进行思考。特别是当共产国际在资本主义相对稳定的形势下，在所属各国共产党内推行“布尔什维克化”的政策以后，更使这种思考不仅对准第二国际，而且也对准共产国际以及俄国共产党的路线和政策。在这方面，最典型的反应见诸于“马克思主义荷兰学派”的一名代表高尔特《致列宁同志的公开信》：革命并不单从一个经济危机中产生，还有进一步的条件；“德国、匈牙利、巴伐利亚、奥地利、波兰和巴尔干的例子告诉我们，危机和苦难是不够的，在这里有最可怕的经济危机——然而革命却没有到来。还必须有把革命带来的另一个因素，而如果缺乏它的话，革命就流产或失败。这个因素就是群众的精神”，因此“必须总是以一种唤醒和加强工人的阶级意识的方式去行动和说话”，并把社会主义建立在无产阶级广大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首创精神、无产阶级群众阶级意识的自由发展的基础上^①

把这种对于西方革命失败的思考，首先提到哲学的高度，

^① 高尔特：《对列宁的回答》，巴黎 1930 年版，第 89、106 页。

形成一股思潮的，是匈牙利共产党人卢卡奇在 1923 年发表的《历史和阶级意识》一书。在这本书里，卢卡奇把西方革命失败的原因，归结为轻视革命主体作用的经济决定论，以及由此引发的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危机。为此，他用“总体性”的观点去取代经济因素首要性的观点，用无产阶级阶级意识创造历史的观点去取代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规律性的观点。他在批评自然辩证法和反映论的同时，强调意志、意识、意识形态、主观性等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性，并提出了一种对马克思主义的自由主义和人道主义的解释。

卢卡奇的这种解释，一是把异化当作它的中心的批判范畴，把资本主义社会描绘成一个异化、物化了的世界，而把共产主义社会说成是“真正的人性”和人的“总体的个性”的实现；二是使马克思主义离开对自然和社会的‘实证主义’研究，去探索客体和客体之间的辩证关系；三是主张把社会看成是各个相互作用和中介的方面构成的‘总体性’，主张‘把孤立的事实同总体性联系起来’；四是认为人本身是历史辩证法的客观基础，并据此把人提到历史的主体的地位上，而拒斥唯物主义决定论。

西方曾经有人把卢卡奇的这本书说成是“20 世纪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著作”；西方共产主义的圣经”；说它对 20 世纪初期革命的思考，可以和康德的三大《批判》对法国大革命的思考相媲美。

和卢卡奇的《历史和阶级意识》一起代表这股思潮的，还有德国共产党人柯尔施的《马克思主义和哲学》（1923 年），布洛赫的《乌托邦精神》（1918 年）也表现了这一思潮。然而，对于这一思潮的奠基和发展具有更大影响的，则是意大利共产党领袖葛兰西，在被囚禁法西斯监狱期间所写《狱中札记》一书中提出的“意识形态和文化上的领导权”的概念和理论。

葛兰西的这种理论认为，革命在西方失败的原因，在于照搬了俄国革命的战略，而没有考虑到两者的前提不同的缘故。俄国的政权是半封建的军事官僚国家，在那里，统治阶级的统治是以暴力为基础的。这样的国家，一旦遇上灾难，被压迫群众起来，群起而攻之，在一场‘运动战’中就把它搞垮了，这就是十月革命的战略；反之，西方国家的政权却是资本主义国家，“在那里，统治阶级的统治，主要不是建立在暴力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统治阶级对于被统治阶级在意识形态和文化上的领导权的基础上，建立在被统治阶级由此而对统治阶级的统治所给予的“同意”的基础上，这就给西方资产阶级政权带来了强大的力量”，它像一道屏障那样，抵御着经济危机和天灾人祸的侵入，把政权保护起来，当那里的无产阶级革命照搬十月革命的“运动战”战略来对付它时，就会遇到在俄国没有遇到过的暗堡、暗火力点，使革命的有生力量遭到大量杀伤。因此，资本主义社会之所以能够在生产力的发展超越了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框框而仍然幸存下来，其关键性的因素，就在于资产阶级持有这种“意识形态和文化上的领导权”。与此相适应，西方国家的无产阶级要取得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胜利，就应该采用‘阵地战’的战略，首先一个又一个地去夺取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和文化上的领导权，只有把这些领导权阵地统统夺过来了，无产阶级才能取得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胜利。

30年代初期，由于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首次公开发表，在一些人看来，似乎使卢卡奇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得到了证实，这就进一步推动了这股思潮的发展。

然而，在另一方面，又由于在1924年的共产国际第五次世界代表大会上，布哈林、季诺维也夫等先后指责卢卡奇、柯尔施的上述著作‘回复到古老的黑格尔主义’；是‘理论上的修

正主义”，并宣布“我们不能容忍”在我们共产国际内有这种理论上的修正主义”。后来，柯尔施被开除出党，卢卡奇作自我批判，这就使这股思潮只能走向党外，首先在德国法兰克福的社会研究所中得到发展；而在党内，则作为一种“地下”传统，或明或暗地存在于一些在理论上持异议的党员的著作中。

直到 1968 年法国爆发‘五月风暴’的时候，由于‘西方马克思主义’被奋起造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反的“新左派”青年学生和工人奉为思想武器，这一思潮才引起西方社会各方面人士的广泛注意。不仅“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个名词脍炙人口，而且在西方一些人的心目中，它还俨然成了“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马克思主义”甚至在前苏联、东欧国家，这股思潮也产生了相当的影响。有一位名叫伊里巴贾科夫的学者在原《共产党人》杂志 1987 年第 9 期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说：“曾有不少马列主义者产生了所谓‘马列主义危机’的虚假观念，认为马列主义‘不能’回答现时代的问题和成为当代条件下行动的思想指南，认为必须‘改造’马列主义和建立某种‘新的’‘西方马克思主义’。”

从上述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形成发展过程的简单回顾中，可以看出，这股思潮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无产阶级革命在俄国取胜而在西方失败的情况下，在西方国家内出现的一股在理论上同列宁主义相对立而又自称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潮。它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批评共产国际和苏联共产党的内外政策；在政治方面，在对现代资本主义的分析和对社会主义的展望上，在无产阶级革命的战略和策略上，它提出了不同于列宁主义的见解；在哲学方面，它提出了不同于苏联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主张‘重新发现’马克思原来的设计。

“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的发展

尽管“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正式形成于 1923 年,但“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个概念的提出,却在此之后,而这个概念的流行,更在思潮出现之后好几十年。

“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奠基人之一的柯尔施,为回答人们对其《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的批评,在 1930 年重版该书时,增补了一篇《〈马克思主义和哲学〉问题的现状——一个反批评》,他在其中多次提到区别于“俄国马克思主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他显然用后者去指以卢卡奇和他为代表的、对马克思主义作出的不同于俄国马克思主义的解释^①。但是,柯尔施对“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个概念的使用,在尔后 20 多年的时间里一直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所以“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个概念也没有因此而流行起来。

1955 年,法国学者梅劳-庞蒂在《辩证法的历险》一书第二章《西方的‘马克思主义’》中,论述了从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开始的一种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他先是说“被这样理解的马克思主义,正因为它拒绝成为一种教条的历史哲学,它应当是一种革命哲学”,接着又从自然辩证法、反映论等方面,论证了“‘西方马克思主义’与列宁主义的冲突”;并且说什么这种冲突“在马克思那里已经作为辩证思想与自然主义的冲突出现了”^②。从此以后“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个概念在西方社会中逐渐被人们所使用。

1976 年,英国《新左派评论》杂志编辑安德森发表《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一书,把“从卢卡奇到葛兰西,从萨特到阿尔

① 柯尔施:《马克思主义和哲学》,1970 年纽约版,第 120、134 页。

② 梅劳-庞蒂:《辩证法的历险》,1974 年伦敦版,第 35、64 页。

都塞,从马尔库塞到德拉—沃尔佩”列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学派或理论家”,并说“西方马克思主义尽管存在种种内
立*歧和对立,却仍然构成一个具有共同学术传统的理论”^①。这样,安德森就扩大了梅劳—庞蒂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使之不仅包括从卢卡奇、柯尔施、葛兰西直到德国的法兰克福学派和法国的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者这样一批拥护黑格尔、赞成人道主义和批判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的人,而且也包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崛起的、以德拉—沃尔佩为代表的新实证主义马克思主义者,以阿尔都塞为代表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者这样一些反对黑格尔、反对人道主义而拥护科学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的人。

对于安德森扩大“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的这种做法,在西方学术界引起了激烈的争论,美国《目的》杂志编辑皮孔、美国麻省大学经济系教师沃尔夫、美国社会学家古尔德纳等人先后发表文章提出种种批评。有的批评安德森没有把英美两国的有关学者包括到“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范围中去;有的批评安德森是按照托派历史编纂学的观点来确定“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座标和理论家名单的,而多数人则批评安德森把反对黑格尔的和拥护黑格尔的人搞在同一个“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里,模糊了两者的决定性区别,不能详述每一方独特的理论贡献,从而使“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变得毫无意义。这场争论在我国海峡两岸学术界也引起了反响。

“西方马克思主义”各流派

那么,“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究竟包括多少流派呢?

^①安德森:《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7页。

“西方马克思主义”各流派分属人本主义(批判的)和科学主义两种倾向。

在人本主义方面，第一个流派便是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它以卢卡奇、柯尔施、葛兰西为主要代表，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在初期也奉行黑格尔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

这种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之所以没有 20 世纪 20 年代中、西欧许多国家的骚乱、起义和革命中崩溃，是因为工人阶级没有发展出充分的阶级意识，没有意识到自己作为一种革命的政治力量所可能具有的使命，而这是由第二国际和共产国际主张经济决定论所造成的。为此，它要求把阶级意识的主观方面恢复到马克思主义中去，认为这就是恢复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基础，其具体办法则是重新占有黑格尔关于人的自我意识的创造性观念，指出马克思主义的黑格尔根源，特别是马克思社会主义观的黑格尔基础。

这种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首先和实证主义相对立而强调历史主义，并据此把马克思主义设想成不是建立在自然主义模式基础上的一种分析科学，而是表现无产阶级世界观的一种意识形态；其次则是反对客观主义而强调人道主义，反对经济决定论而高扬人在建构和改造世界中的创造性作用。这种历史主义和人道主义，在卢卡奇那里最终归结为浪漫的反资本主义和反科学主义，而在葛兰西的实践哲学中则表现为唯实践主义。

有一种说法把“西方马克思主义”中的这种黑格尔主义马克思主义，同列宁的黑格尔研究混为一谈。这是没有根据的。因为一般地讲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特殊地讲卢卡奇的《历史和阶级意识》，依据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一书的基本精神，强调革命过程的唯意志论方面，并据此批评历史决定论、自然辩证法和反映论，而列宁则通过对黑格尔《逻辑科学》的

研究，维护历史决定论、自然辩证法和反映论。正因为这两种黑格尔研究标志着两种不同的思想路线，因此，西方学者雅可比指出：“马克思主义的不同学派都求助于黑格尔”，而“没有辨认出两种黑格尔传统则模糊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①

“西方马克思主义”在人本主义方面的又一条思想路线，是以奥地利学者赖希和法兰克福学派代表马尔库塞、弗洛姆等人代表的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

这条思想路线出现的原因，是因为它的代表认为，在马克思观察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问题的时候，他预测了两个并行并进的过程：一个是资本主义制度经济崩溃的过程，马克思以某种明确性预言了这个过程；另一个是工人阶级政治意识的成长和发展的过程，马克思对这个过程讲得较少。由于在马克思思想中有这个空白，由于马克思没有提出这么一种社会心理学，第二国际的庸俗唯物主义者就假定工人阶级意识的发展，是导致资本主义崩溃的那同一个经济过程的自动反映。然而，当资本主义矛盾尖锐化，马克思主义期待欧洲工人阶级作为历史变革的动因而出现时，工人阶级却保持着沉默。据此，弗洛伊德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有的代表认为，这些情况表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人们不但被外部的压迫者所统治和剥削，而且也被那些阻止他们把自己解放出来的意识形态所统治和支配；另一些代表则认为，意识形态被人们内在化或被溶化在个人的性格结构中，被埋置在个性结构中，它远远落在经济现实后面，因而他们就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去补充马克思主义，并把社会主义革命纳入到性本能的压抑和解放的渠道中去。

^①雅可比：《失败的辩证法——西方马克思主义轮廓》，1981年剑桥大学版，第37页。

弗洛伊德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把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焦点从政治经济学转向上层建筑现象，特别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支撑着、合法化着压迫性社会关系的文化形式和意识形态。

“西方马克思主义”在人本主义方面的再一个流派，是以梅劳一庞蒂和后期萨特为代表的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

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出现的原因，是因为它的代表、特别是萨特认为，虽然马克思主义是我们时代不可超越的哲学，辩证理性是上升阶级的意识形态，但它在现代马克思主义者手里却停滞了，理论脱离实践而成为教条主义，实践脱离理论而成为实用主义。为使马克思主义不变质成一种非人的人学，就必须把人本身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基础重新纳入自身之中，就是说，必须借助于存在主义，把马克思主义重建成一种以“人创造历史”为第一真理的、人的自我解放理论。因为存在主义在凡是人所在的地方，在他的劳动中，在他的家里，在马路上，到处去寻找人。

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主要本质在于人的自我创造实践。为此，个人实践应当成为辩证方法的基本出发点，个人自主和自由意志应当成为马克思主义所向往的未来的阶级斗争的源泉。在这方面，马克思主义和存在主义是关于自由和行动的两种可以和谐共存的哲学。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主张为解释人类经济的相互补充的方面确立一个共同的格子，在马克思主义从人类活动的结果的角度出发去理解历史的客观方面的框架内，用存在主义去理解个人主观的生活经验。

在 20 世纪 40 年代以后，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中又出现了属于科学主义传统的一些流派。

科学主义方面的第一个流派，是以意大利的德拉一沃尔

佩为代表的新的实证主义马克思主义流派。

新实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认为，无产阶级革命在西方国家之所以失败，是由于对现代资本主义作了不正确的理解，用含糊的人道主义和黑格尔修辞学去取代了科学政策的缘故。为此，它断然否认在马克思主义和黑格尔之间有任何连续性，而主张把科学的辩证法规定为以“具体—抽象—具体”循环为标志的现代实验科学的唯物主义逻辑，把历史唯物主义铸造成一种“道德上的伽利略主义”，一种建立在青年马克思批判黑格尔的谰妄逻辑和从本质上升到假设以及从先验断言上升到实验预报的基础上的科学唯物主义的 sociology，以便使它再次变成能够进行阶级分析和预言的决定性认识工具。这个流派对马克思思想的发展持一种从早期著作直线前进到《资本论》的无差别的见解，而它对社会科学的假设——推理形态的说明，则是极端自然主义的。

“西方马克思主义”在科学主义方面另一个更有影响的流派，是以法国的阿尔都塞为代表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

当 50—60 年代人道主义在法国思想界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广泛泛滥的时候，阿尔都塞用结构主义去干预形势，说“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人本主义各派都否定科学所专有的东西：客观知识的生产。它们把自然科学当作是资产阶级的，结果都陷入了相对主义，并把历史唯物主义相对化，减弱了它的科学性。为此，阿尔都塞倡导按照结构主义精神去读解马克思的思想。

结构主义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把主体归结为一种非人结构的从属的代理人。根据这种“主体移心论”，结构主义否认个人在认识和实践中的作用，否认思维主体能够在认识论中居于哲学思考的中心地位。它把人融化到客观化的、无个性的和无意识的结构中去，认为正是这些结构在决定着人的全

部行为，它们是人的全部生存的结构，而主体则是消极被动的。但在另一方面，结构主义又认为，世界的结构并不是客观世界固有的，而是人类心智的产物，是人的心灵的无意识的能力投射于文化现象的，是人脑的结构化潜能对混沌外界的一种整理和安排。在哲学上，结构主义属于那种认为理论对于经验具有首要性的理性主义传统。

以阿尔都塞为代表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按照结构主义精神读解马克思思想的结果，是把马克思的思想划分为早期非科学的意识形态时期和晚年的科学时期，把马克思主义解释成一种理论上的反人道主义、反历史主义、反经验主义和反经济主义。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特征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各流派之间存在着一系列共同特征，这些特征一方面作为规定性把这些流派规定为同属“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流派，另一方面又作为区别性，把“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其他思潮区别开来。

首先，从组织上来说，“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特征，便是理论与有组织的工人运动相脱离。由于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基本上处在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的领导之下，而“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在理论上则是同社会民主主义、列宁主义相对立的，因而就不能不长期处在同有组织的工人运动相脱离的状态。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中间，除卢卡奇、柯尔施、葛兰西曾在所参加的共产党内担任过领导职务外，有些人（如德拉—沃尔佩、阿尔都塞）虽然在组织上是共产党员，但其著作却是同党的路线不相干、脱离工人运动的学术作品，有些人（如法兰克福学派和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代表）更是在党外，在学术框框里展开其理论研究的。“西方马

克思主义”的这个特点决定了它的位置在讲坛、书斋里，讲的和写的都是一些为普通工人所不懂的语言，从而也就把其听众主要限于知识分子。

但这并不意味着“西方马克思主义”具有像安德森所说的“与政治实践相脱离”“非政治化”的特征^①，因为这个思潮的理论家用艰深的理论进行考察和用晦涩的语言来表述的，往往是一些和现实政治有着密切联系的问题，在有成千上万的青年学生和工人群众参加的 1968 年的五月风暴中，它之所以会成为新左派的思想武器，原因就在这里。不仅如此，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社会阶级结构方面的发展变化，“西方马克思主义”还由脱离有组织的工人运动逐渐发展成以激进的青年学生和“新工人阶级”作为自己的阶级基础，这在法国的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者和德国的法兰克福学派左翼那里尤其明显。但是，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际上，“西方马克思主义”都没有形成自己的组织，它主要通过自己的理论去影响西方的新左派运动。

其次，从研究领域来说，“西方马克思主义”注意的焦点由经济基础转移到哲学和文化等上层建筑。安德森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轨迹》两书中，曾一再把这个特征概括为“倒转了马克思本身的轨道，理论中心由经济、政治转向哲学”^②。由于这种说法不符合实际，因而遭到许多西方学者的批评。第一，“西方马克思主义”为什么主要关心于文化、意识形态问题？卡林尼柯斯认为，这种偏爱是有其“政治根源”的：“推翻资本主义一旦不再被认为被经济的运转所

① 安德森：《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第 46—47 页。

② 安德森：《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第 65—69 页；《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即《历史唯物主义的轨迹》），1989 年东方出版社版，第 12 页。

保证，支撑和毁坏资本主义制度的机制就变成了理论分析的对象^①。马丁·杰指出：“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大力研究“发达资本主义据以阻止获致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手段。在这个过程中，文化的批判作用被肯定了”^②。还有一些学者则指出，“西方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强调意识形态和文化因素，是因为它们在西方的历史变革中具有核心的重要性。第二，正因为这样，就不能把“西方马克思主义”以上层建筑为主要研究领域，说成是一种倒退、退却。雅可比认为，在“西方马克思主义”那里，“哲学著作占优先地位，不是标志着退却，而是标志着前进到去重新考察马克思主义”在这里“哲学命题渗透着政治上的选择和策略，西方马克思主义和苏联马克思主义之间在政治上的对抗，最终是由哲学上的对抗来支撑和有规则地重新点燃的”^③。博格斯则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承担起了重建整个哲学基础的任务”，以便“重新强调主观性、意识、意识形态，重新发现哲学和辩证法”。甚至“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领域从经济基础中转移出来，也是一种“在理论层次上逃避资本逻辑的自觉努力，这是人们理解其理论主旋律的唯一方法”^④。

再次，从和其它思潮的关系来说，“西方马克思主义”公开强调要利用资产阶级思想的伟大成就。在这方面，不仅有从“水平轴”来说的，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现代西方资产阶级理论“结合”起来，如借用韦伯、齐美尔、狄尔泰、克罗齐、弗洛伊德、胡塞尔、海德格尔、白喜拉、坎吉尔汉、拉康等人的概

① 卡林尼柯斯：《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第 127 页。

② 马丁·杰：《马克思主义和总体性》，第 8 页。

③ 雅可比：《失败的辩证法》，第 7 页。

④ 博格斯：《两种革命——葛兰西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困境》，1984 年波士顿版，第 6、20—21、278 页。